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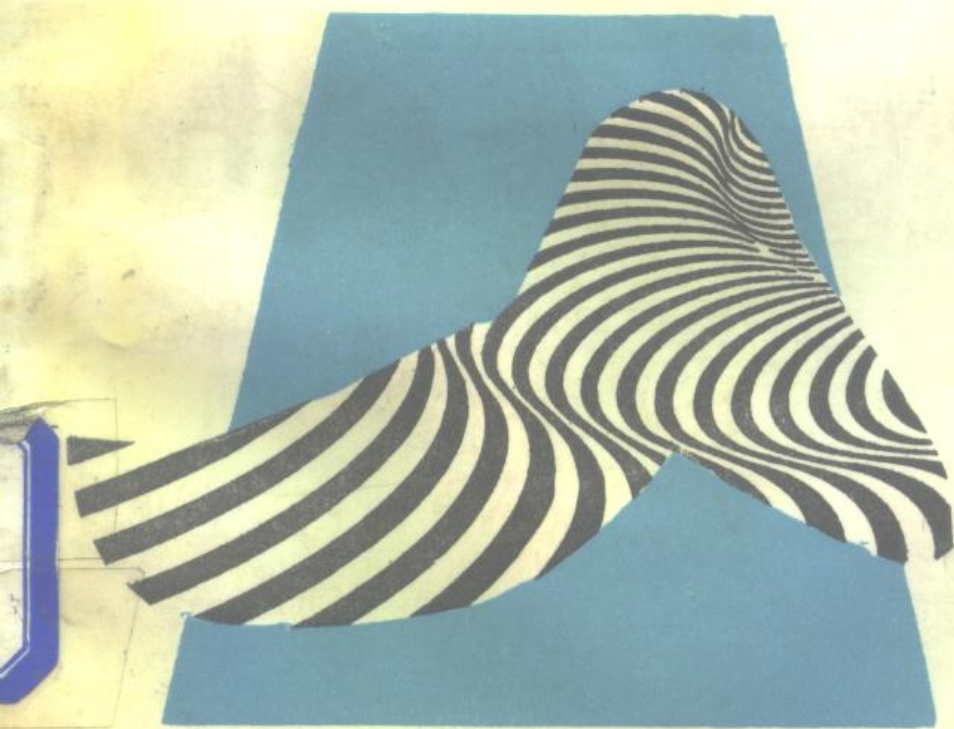
HUANTONGREN YU XIANDAI REN CONGSHU

人生成功的道路

—— 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家精神探索
的艰难历程

韩钟文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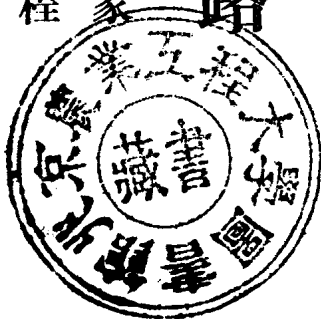
职工教育出版社



人生成功的道路

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家
精神探索的艰难历程

韩钟文 著



职工教育出版社

人生成功的道路

——中国现代启蒙思想家精神探索的艰难历程

韩钟文 著

职工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教场胡同4号)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150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710册

ISBN 7-80059-226-X/C·017 定价：3.30元

C912-51

1.4



总 序

中国就象一个沉睡的雄狮，醒来了。

然而，带给人们的是什么？

似乎并不只是激昂、振奋，其中夹杂着许多苦闷彷徨，人们感叹中国的落后。

.....

历史给中国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曾几何时，中国人多么自豪，四大发明，悠久的历史……“中华帝国”——世界的中心，时代的巨人。然而当人们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被历史甩到了后头。

于是，有人叹息，有人哀愁，有人愤愤然埋怨自己命运不佳，有人则打点行装，通过各种途径，投奔异国他乡。

中国人真的丧失了自信心？

这并不是事实。许多有识之士已在深刻地反省，试图找出一条振兴中国之路。

古与今，中与西，有人深刻地对比，发现是中国传统影响着中国的发展。传统的观念思维、道德以及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一切的一切，集中到中国人身上，决定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难、曲折。因此有人疾呼：要想改革，走向现代化，必须从人开始，使中国人成为真正的现代人。

.....

“上帝死了”，尼采这样说。

这有什么关系。人为什么要崇拜虚幻？从传统中走出

来，本身就是一个进步。

但为什么要妄自菲薄？难道传统的中国人就一无是处？

我们的祖辈、父母，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这传统文化的熏陶下生存着，要想割裂传统怎么可能？

但社会要发展，不能永远停留在过去。以古为鉴，可以知得失，但却不能抱着古代不放。新时代需要新文化，需要新的情感、意识和观点，但更需要的却是载负着这些新型的主体——人——现代人。

现代人有什么特点？它与传统人有什么差别？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现代人呢？

传统人与现代人，它是不同时代文明的产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延续体。

从传统人到现代人，这期间要经历变革，甚至激烈的冲突，但也要有承续和认同。

要成为现代人，必须了解和认清什么是传统人。

《传统人与现代人》丛书正是本着这样的宗旨编辑出版的，它从人的角度，着力论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希望通过比较寻求一条现代人的发展途径。

我想该丛书是会给你以启示，使你做一个真正的现代人的。

编委会

一九八九年一月

引 言

“象你们的民族那样伟大的民族，是经得起任何危机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恩格斯1893年10月17日写信给俄国朋友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时，论及俄国的命运写了这段蕴含着哲理的话。

从1893年到现在，历史的车轮已经推进了近一个世纪，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不论前进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不论是中国走向世界还是世界走向中国，不论是“巨大的历史灾难”曾经怎样一次又一次地使中华民族陷入苦难的深渊、陷入空前的浩劫之中，然而，历史毕竟前进了，中华民族闭关自守的局面终于被打破了，沉睡的东方雄狮在西方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觉醒了，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终于走出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向现代化社会迈进了。

中国是在汹涌澎湃的世界现代化的浪潮冲击下觉醒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幕又一幕悲壮的历史剧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演出。新的历史舞台的出现促使人们做出新的抉择，从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是每一个立志于跟着社会前进的中国人的必由之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林则徐、魏源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从孙中山到陈独秀、胡适、鲁迅，从

鲁迅到巴金，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解放运动的前驱，都是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历史舞台的转换，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他们用自己的勇气、智慧和力量，开拓着中华民族通往现代化的道路。

“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象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诗人海涅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做的预言，也可说明中国的现代历史进程。一个多世纪以来，面临着全面的、严峻的历史挑战的中国，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启蒙思想运动，思想解放的浪潮冲击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戊戌变法、五四新文化运动、七、八十年代的第三次理性觉醒，思想解放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伟大时代，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陶行知、巴金……真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启蒙思想家是传播现代化火炬的普罗米修斯，他们走向世界追求真理的勇气，他们开拓百家争鸣局面的自由精神，他们“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精神，他们提倡启蒙又超越启蒙的执着精神和韧性毅力，他们严于解剖自己灵魂的赤诚之心，他们勇于开辟和创造的精神，他们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胆识和气魄，他们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战略眼光，他们寻求中国的脊梁和发掘民族生命力的根柢的胆略，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他们那“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爱国激情，他们开创的思想范式，都给我们以无穷的启示。

历史是一面镜子，沿着启蒙思想家精神探索的历程沉思，可以领悟人生的真谛，尤其是在人们还呼喊着重要

的就是要补上‘德先生’与‘赛先生’这一课，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先决条件“的今天。

本书在编著过程中参考和吸取了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并得到张立文教授的精心指导和职工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韩钟文

一九八九年一月于信江之畔

目 录

引 言

第一章 走向世界 1—36

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先驱者的回应；中国的普罗米修斯的悲剧命运；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的宏愿；福泽谕吉型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走向世界后的反思；教育是教人学做现代人；呼唤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

第二章 精神自由 37—75

从清皇朝的翰林学士到辛亥革命的民主战士；北京大学自由精神的奠基者蔡元培；教育要摆脱封建专制政治的羁绊；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改革方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

第三章 理性批判 76—117

科学与民主以雷霆万钧之力冲击着古老民族的灵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新时代；胡适认为新思潮的目的是再造文明；从全盘西化到充分世界化；首先打开大局面的闯将陈独秀；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对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文化论的再批判

第四章 思想解放..... 118—155

尼采“狮子精神”的启示；梁启超论思想解放的伟大意义；李大钊推崇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百家争鸣的局面下传播马克思主义；巴金在《随想录》中怀念鲁迅；鲁迅不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改造国民灵魂的文学总主题；从国民性格劣根性的批判到中国的脊梁的寻求；启蒙思想家的自我批判

第五章 创造开辟..... 156—190

现代教育创造着现代人；陶行知呼唤第一流的教育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大师在教育领域的开拓；杜威实验主义教育观在中国的传播；教育改革要适应中国的国情；拿着现代文明的钥匙去开发现代文明的宝库；现代更需要开辟与创造的精神

第六章 理性觉醒..... 191—221

一个民族都能以哲理的眼光去观察事物；理性的觉醒、困顿、沉思、再觉醒；“五四”的愿望到今天并不曾完全实现；巴金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生的法则就是战胜死神；从《激流三部曲》到《随想录》；鲁迅、巴金是二十世纪中国的良心；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双重历史使命

第一章 走向世界

(一)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时期，是中华民族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时期，也是欧美先进国家政治、工业革命的浪潮冲击闭关自守的中国后，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在沉睡中觉醒、走向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时期。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国留学潮的出现，是落后、贫苦的中华民族渴望重新崛起的标志。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欧美，二十世纪初的留日热潮，辛亥革命后的留美热潮，五四时期的留法勤工俭学，一浪高于一浪。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在建设现代化强国方面取得的成就，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从盲目的文化优越感、自豪感中醒悟过来，鸦片战争以来受西方列强侵略、侮辱的现实又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走向世界，到西方去寻求拯救中华民族的良药，这是历史赋予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尽管这是一条充满痛苦和屈辱、艰辛和曲折的道路，尽管这条道路要人们用汗水、心血和全部力量去开拓，但是，要使中国人民从封建的

制度中解放出来，要使中华民族从闭关自守和落后的生产方式中摆脱出来，舍此别无良策。向西方学习，走向世界，几乎是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期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共同的追求。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舞台是演悲剧的，登上这一舞台的角色要充当现代的普罗米修斯，要从侵略、侮辱、欺凌自己的帝国主义列强统治的国家中偷盗“神火”。尤其是那些孤独的先行者，还要冲破国内统治者制造的政治的、精神的枷锁。中国第一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知识分子郭嵩焘，就是在如涛似浪的骂声中度过余生的悲剧人物。

“傲慢疏慵不失真，唯余老态托传神。流传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这是郭嵩焘临终前不久写的一首诗，题为《戏书小象》。这位孤独的先行者提出的“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的观点，不会因为他冷落寂寞的死而消失，它象寒夜中的火炬，很快地变成熊熊烈火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燃烧着。从1891年郭嵩焘在湘阴县城家中病逝，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时间仅有二十八年。走向世界、向西方学习、到西方寻求救国之路的浪潮，已经推动着中国的历史滚滚向前了，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孤独的先行者的微弱呐喊在历史的转折时期竟然汇成时代的洪涛。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1875年，清政府组织了一次关于洋务方针的讨论，郭嵩焘呈上著名的《条议海防事宜》，受到了清政府的重视。恰好因处理“马嘉理案”，清廷要派大员赴英“通好谢罪”，郭嵩焘遂被任命为出使英国的钦差大臣，于1877年1月27日抵达伦敦。到

1879年1月31日离任归国，时间虽然仅仅两年，但作为“天朝帝国”亲历西方世界考察的高级知识分子，他对西方的民主政治、科学技术、哲学伦理以及文化教育有了新的认识。他真正懂得了西方进步的原因，认为“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泰西制造机器所应取效者，岂直枪炮而已哉”？“西洋立国以政教为本”，呼吁人们象日本那样大规模地向西方学习。“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要莫急于学”。“日本大小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泰西言者皆服其求进之勇”，而“中国寝处积薪，自以为安”。郭嵩焘比较中西文化后得出的结果，是走向世界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理性觉醒的先声。

郭嵩焘为了使中国领导阶层认识西洋各国比中国先进的事实、有勇气承认自己落后而奋起直追，他将出使英国途中所见所闻及自己的感想逐日记载下来，写成《使西纪程》一书，到伦敦后寄回总理衙门。他万万想不到自己热切救国的心情会遭到一场冰雹的打击。清廷听信“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的谗言，除下诏命立即销毁《使西纪程》字版外，还将郭嵩焘从驻英法公使任上撤回。从此，这位走向世界的先驱称病乞休，忍辱负重，在疾病与苦闷的折磨下度过了晚年。

“如果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遥远么？”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诗人雪莱，曾在古希腊诗人、剧作家埃斯库罗斯之后，创作了《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一剧，表现了欧洲人民反抗专制暴政、争取民主、自由的理想；宣告旧时代必然被埋葬，新纪元的曙光已经来临。从“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到“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从古希腊民主制度的创立与自然

科学的兴起，到十八世纪、十九世纪欧洲工业革命、政治革命的浪潮的形成，现代科学和现代民主的精神火炬照亮了人们走出中世纪黑暗的道路。然而，中国的“普罗米修斯”要走出中世纪，不仅要到西方偷盗“科学”和“民主”的火种，而且还要同“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封建官僚做顽强的斗争。他们那种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走向世界的精神往往带有悲剧色彩。“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郭嵩焘在伦敦写给朱克敬（香荪）的信，表达了先知先觉者不计较“世俗的毁誉”的勇气和信念。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周作人等，高举“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的大旗，以披荆斩棘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冲击封建文化、封建道德和宗教迷信，并使启蒙能高歌行进，固然与时代潮流的推动及领导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胆量、才智及爱国热情有关，更与从郭嵩焘到孙中山、从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那些走向世界的“普罗米修斯”的开拓、创造密切相联。历史的新纪元是由一代又一代的走向世界的先驱者共同开辟的。

如果说科学与民主的精神火炬是引导中国人走出中世纪的曙光，那么，这曙光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走向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灵中已经升起。他们最宝贵的、至今也使人叹服的精神，就是象普罗米修斯那样牺牲自己偷盗“神火”。梁启超谈到郭嵩焘说：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噫哟！可了不

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板，才算完事。”①

梁启超所说的“一部游记”就是《使西纪程》。这本被清廷禁毁的《使西纪程》首先对西方文化挑战做出反应，大胆承认西方不仅“有二千年的文明，”而且有比中国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郭嵩焘通过亲身考察和认真反思，初步接受了西方现代的民主与科学的观念，并以这种初步的现代观念作为批判旧观念的精神武器。他指出：

“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

“巴力门（Parliament，议会）君民争政，互相残杀，数百年而后定，买阿尔（mayor，市长）独相安无事；亦可知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戢，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

“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②

郭嵩焘是位具有反传统情绪的学人；他在同治年间写的日记中，就认识到“自秦任法吏矫虔天下，民之受其迷者二千余年。”加上政治上的失意，他渴望寻找一条摆脱专制思想束缚的新的出路。“办洋务”使他初步开阔了眼界，深感“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悉其语言文字”而造成外交上吃

亏上当的惨痛教训。所以一旦获得机会走向世界，他即敏锐地去探究导致西方发达强盛的根本原因。

郭嵩焘突破了“用夏变夷”的观念，不再象洋务派李鸿章、丁日昌和张之洞那样，虽然清醒地认识到大清帝国面临着西方强敌的威胁，感触到受西方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浪潮冲击的压力，睁开眼睛看世界了。但是，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却只限于引进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以西方的“末学”来补自己的不足，而不是同时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政治制度、道德教化优于“外夷”，中国的“本学”是牢不可破的。丁日昌所说的“西学除船械一切必须效法西洋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模，加以实意”；冯桂芬所说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诸国富强之术”；张之洞所说的“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都是在“华夷”观念束缚下只着眼于西方文化的表层，而没有触及文化的深层和内核的偏弊。郭嵩焘的突破就在于认识到不仅要引进西方的物质文化，而且更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及精神文化的核心——哲学。他从“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日本人身上受到启发，从自己的亲身考察得出结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未中之一节也”。这种将西方文化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对“本末”有自己独特看法的思想，的确是郭嵩焘的卓识。他呼吁中国人要“循习西洋政教”决不是偶然的。他的呼吁只有到了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发起思想启蒙运动时，才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

郭嵩焘不仅考察了以议会民主和自由选举为特征的西方

民主政治，而且还指出这种民主共和制与中国秦汉以来的官僚专制政治是根本不同的政治形态。他认为“泰西”“享国长久”、“日致富强”、“人才学问相承以起”以及学校“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都与政治制度的先进有关。“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行”，“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立国之势，与百姓共之”，“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急取泰西之法推行之”，这种高度评价西方民主政治以及向西方学习的决心，充分体现了走向世界的先驱者的胆量和气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郭嵩焘开始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探究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途径。他对西方文化的两大先河——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文明都有所了解。他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介绍过希腊哲学家“退夫子”（泰勒斯）、“毕夫子”（毕达哥拉斯）、“锁夫子”（苏格拉底）、“巴夫子”（柏拉图）、“亚夫子”（亚里士多德）、“安夫子”（安提西尼）、“杜知尼”（第欧根尼）以及“呶夫子”（伊壁鸠鲁）等人的哲学观点，并指出“希腊学问从亚力克山太以后传播天下，泰西学问皆根源于此。”这是他强调的西洋“也有二千年的文明”的依据。他还指出西方的伦理以基督教精神为主，与中国伦理以儒家思想为主有着质的区别。“中国圣人之教道，足于己而无责于人”，“专于自守”，“西洋基督之教”“为教主主于爱人，其言曰‘视人犹己’”，是向外的。能够把握住中国文化内在超越与西方文化外在超越的特征，其比较是有一定深度的。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中对西方的希腊哲学和基督教文化的译述与评价，目的是为了纠正人们对西洋文明的片面看法，使“中国士大夫”改变“妄自尊大”的病态心理，